

# 复线的历史:金元时期平阳文化叠加中的移民因素

刘丽<sup>a</sup>,刘佳<sup>b</sup>

(山西师范大学 a. 现代文理学院 b.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山西 临汾 041004)

**摘要:**表里山河的特殊山水环境造就了平阳相对封闭的地理空间,维持着平阳内部秩序的相对稳定,使之在动荡年代成为移民的庇护所;而平时则是户口的输出地,有助于平阳文化的汇聚和扩散。有限的封闭与稳定使得平阳保存着大量文物与遗迹,成为清末民国时期学界建构金元平阳文化记忆的重要依据。当然,文化的发展不仅仅是凝固,更多的是不断的叠加。历史上以平阳为中心的晋南地区是民族融合的大舞台,源源不断的塞外移民在汉化的同时,也以其独特的部族习俗改造并影响着当地的生产生活。尤其在金元时期,女真、蒙古诸族所带来的异质文化和统治理念,是金元平阳文化丰富而又驳杂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金元时期;平阳文化;移民

**中图分类号:** K2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57(2019)04-0096-05

**DOI:**10.16207/j.cnki.1001-5957.2019.04.017

对于过去,杜赞奇主张采用“复线的历史”进行解构。在他看来,历史就是说明过去是如何一路走来的过程。然而,当下即目的,使得历史叙述呈现出简单化的倾向,遮蔽了这一过程中丰富多彩的各种可能。<sup>[1]导论2</sup>关于文化的认知,亦未能幸免。葛兆光指出,中国文化本来是复数的,后世却做了单数的选择。<sup>[2]15</sup>金元时期平阳文化的丰富性,很大程度上与历史时期的移民所带来的民族融合密切相关。然而,无论是元以后的明朝,还是清以后的民国,对此民族融合所带来的异质文化采取了选择性的失忆。因此,对于平阳文化在金元时期的发展情况,有必要从移民方面进行思考。要阐明这一点,尚需对金元时期“平阳文化”繁盛记忆的生成过程做一番系统梳理。

## 一、繁盛:金元时期“平阳文化”的历史记忆

记忆,是指个人或集体对过去的回忆,不仅包括记忆的对象,同时,其本身的不断传承、延续的过程也构成了历史。至于平阳文化,自有其发展的客观过程,然而,后世对该过程的把握,无法以上帝的视角做出全景式的描绘。不过,就历史记忆的功用而

言,其“本身的真实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应该把历史记忆产生和流传的过程这样的—个历史的真实纳入我们的研究视野中”<sup>[3]30</sup>。

“平阳”,取义于平水之阳,作为地理概念,已知最早出现在《左传》“昭公二十八年”。秦汉时平阳设县,属河东郡。此后,相继称平阳郡、晋州、平河郡、临汾郡、平阳府、平阳路、晋宁路等。总之,历史时期,“平阳”辖域范围大小不一:“小平阳”约与今临汾辖地相近,“大平阳”则包括今之晋南地区,以元代“平阳路”为参照,还包括晋东南地区。今天,作为一个地理概念的“平阳”已经成为一种历史,但“平阳”一词的文化意义却没有消失。考古发现,自石器时代这里就有人类的活动,且流传着伏羲、女娲、尧、舜、禹、皋陶等人类文化始祖的大量传说。迄今,这些古老资源成为平阳的文化符号,承载着当地的历史底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尧文化。研究表明,战国时尧被编入五帝系统,成为古帝王之一。至汉,“三皇五帝”的古史系列定型,遂有“尧都平阳”的说法。<sup>[4]144-149</sup>当然,这些也不只是传说,20世纪80年代,襄汾陶寺遗址的系列发掘成为“尧都平阳”的重要证明。2016年,许宏与何努关于二里头

收稿日期:2019-05-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8ZDA213);山西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WL2016ZXSH-SJ78)

作者简介:刘丽,女,河南南阳人,山西师范大学现代文理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与陶寺到底谁是“最早中国”的辩论,使得平阳再次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如果说,尧文化是先秦平阳文化典范的话,那么,金元的平水刻、杂剧、河汾诸老等则是近世平阳文化的代表。那么,作为一种历史认知,后者大放异彩是否历史事实呢?的确,金元时期平阳的文化遗存堪居全国之首。可是,这种现象只能说明该地域的文物相对保存完整,不能据此认为就是其所独有的。毕竟,特殊的山水环境有助于历史遗存的保存。“表里山河”是先秦人对平阳地理环境的整体概括,具体而言,其外,大川高山环绕,仅有少量的渡口、关隘联系周边区域,使之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有助于保持内部秩序的稳定;其内,地形多样,山地、丘陵、盆地交错分布,形成极为复杂的格局,纵横的河流又使得内部交通畅通,相互间联系紧密,构成一个统一的文化单元。从整体上看,相对封闭的空间有助于文化的汇集和凝固。谭其骧曾说,为什么在金元时代,山西高原的经济文化反而要比邻近的河北、关中平原发达呢?其初步解释是,由于宋金、金元时期平原一带受战争的摧残比较严重,山西受的战祸较轻,比较太平之故。也正因为经济发达、人口稠密,才有了明初的移民之举。<sup>[5]</sup>谭先生的论断阐述了一个重要的观念:稳定的秩序有助于文化的汇聚和扩散。正因为如此,金元已降,该区域的文化变动缓慢,封闭状况使得大量遗存得以延续和保存。这在重视证据的学者看来,如获珍宝。据此,民国学者给予其极高的评价。

王国维根据元初耶律楚材请立“经籍所于平阳”的记载,提出了“元初除大都外,此为文化最盛之地”的结论。<sup>[6]</sup>事实上,平阳经籍所仅存三十二年。目前见到的蒙元时期的平水本大都是坊刻,因此,平阳经籍所是否刊刻过书籍还值得怀疑。<sup>[7]</sup>王国维还提出,元杂剧家“北人之中,大都之外,以平阳为最多”<sup>[6]76-77</sup>。然而,从王国维本人的统计看,真定与平阳一样多,均为七人,而东平至少也有六人。尽管其论断有明显的瑕疵,但它仍然为后世所认同,刘念兹认为平阳为文化最盛之地是元杂剧在平阳形成和发达的一个最好的理由。<sup>[8]</sup>黄竹三指出,金元时期,平阳是北方重要的文化活动中心,“这儿戏剧艺术的繁荣是先于大都的。”<sup>[8]76</sup>可见,这种学术性权威话语为后世所认同并被一再选择和引用,从而获得一种新的“资料”地位。又如,叶德辉曾提出“平阳书坊荟萃”的观点,<sup>[9]</sup>也为后世许多学者所接受。以此为前提,《中国版刻图录》称北宋亡后,平阳代替汴京成了黄河以北地区的出版中心。<sup>[10]序言3</sup>有学者发挥说,金元时期平阳刻书业定是

“书坊林立、行业兴隆、行销售四方的繁荣景象。”<sup>[11]</sup>甚至有人大胆推测,“金代平阳刻本见于著录的书坊共有8家,无坊名的坊刻本有17种,若按每一书坊刻书两种计算也应有八九家书坊。”这样一来,金代平阳书坊总量当在二十家以上,与南宋的杭州书坊数相近,从而得出元代平阳书坊业是超过金代的结论。<sup>[12]136-137,145</sup>李致忠总结说:金时已经形成的山西平阳地区的刻书出版事业,金亡后不但保存了下来,而且进一步发展成为中国北方地区名副其实的出版中心,并影响到现在河北省的一些地方,乃至整个腹里地区。<sup>[13]331</sup>不难看出,以“平阳书坊荟萃”为前提,从而推导出平阳成为黄河以北的出版中心的结论,离不开历代学人的层累建构。

## 二、移民:平阳文化的活力之源

平阳自古就是民族交融的舞台。千百年来,以匈奴、鲜卑、女真、蒙古等为代表的北方诸族先后徙至平阳,移民带来的异质文化影响并塑造着平阳文化的形态。春秋时,以平阳为根基发展起来的晋国,即以战争、移民、通婚等各种形式与周边少数民族发生着联系。战国时,“魏绛和戎”以及赵武灵王变革风俗之举等民族融合的重大事件,影响深远。这使得平阳虽为陶唐古都,然其风俗具有双重性,一方面,自然条件局限,“唐地确确,其人俭而蓄积,外急而内仁”;另一方面,受游牧民族风俗影响,“刚强多豪杰,矜功名,薄恩而少礼。”<sup>[14]897-898</sup>秦汉以降,平阳成为匈奴部族南下内徙的居留地。按《汉书·功臣侯表》,汉武帝将归附的匈奴贵族封至上党襄垣和河东猗氏。光武帝时,南匈奴入居汉地,一位被逐单于扶罗(刘渊之祖)落脚点就在平阳。<sup>[15]2965</sup>曹操始分匈奴为五部,“由是平阳、西河、太原、新兴、上党、乐平诸郡靡不有焉。”<sup>[16]2548-2549</sup>魏末,五部之中“监国者居平阳”<sup>[17]2147</sup>。平阳成为匈奴部族聚居的稠密地方。由于平阳地处长安、洛阳之间,一旦中原有变动,平阳戎狄势必会趁势而起,御史郭钦洞悉于微末,发表“徙戎论”<sup>[16]2549</sup>。不过,这一建议并未得到朝廷的重视。十六国初,刘渊立都于此,曾设“单于左右辅,各主六夷十万落,万落置一都尉”<sup>[16]2665</sup>。这里的“六夷”估计是指汉族以外以匈奴部众为主体的少数民族,安介生估计“刘氏所辖‘六夷’当在百万人左右”<sup>[18]63</sup>。是时,平阳还有许多羌、氏、羯、鲜卑等民族徙至该地。这一时期,经过各民族战争、吞并与融合,平阳文化中被注入了新鲜血液。五胡迭兴,晋地是基础,平阳至为重要,陈寅恪在《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中指出“取塞外野

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sup>[19]363</sup>此论断指出了华夏帝国重现大一统,北朝民族融合功不可没。同样,民族融合也影响并改造着平阳文化。

金元是继魏晋南北朝时期之后又一次民族大融合的时期。金人攻入中原后,在河北、河东各地留兵驻守,天会年间,女真散居汉地,“比屋连村,屯结而起。”<sup>[20]72</sup>从熙宗天眷年间到皇统初年(1138—1141年),金人“自本部族徙居中土,与百姓杂处”。政府“计其户口给以官田,使自播种,以充口食”<sup>[20]275</sup>。13世纪初,蒙古人崛起,多因作战和镇守等原因徙至该地。按扎儿的探赤马军驻守平阳等地,铁连监隰州。<sup>[21]3006—3007,3247</sup>蒙古军有“即营以家”的传统,即世代驻守一地。平阳有行省兵马都元帅塔察儿及其后代镇守闻喜。壬辰年(1332年)塔察儿忽神公平汴而西,“大河东分置营幕闻喜之东镇”,又“附镇而居”<sup>[22]洞霞观记41</sup>。其后八撒儿亦“以先世奉诏,驻兵平阳,今闻喜东镇,遂第居焉”<sup>[22]八撒儿德政碑38</sup>。平阳还是金元两朝皇室的分封地,金朝冀王永功、镐王永中、豫王永成、卫王永济均分封于此。<sup>[23]116—117</sup>蒙元统治者曾将平阳“一道细分,使诸妃、王子各征其民,一道州郡至分为五、七十头项,有得一城或数村者,各差官监督”<sup>[24]河东罪言364</sup>。史载,拔都受封平阳41302户;塔丑万户得到平阳等处186户;塔察儿得到平阳200户;独木干公主受封平阳1100户等。<sup>[21]卷九十五2414,2433,2435,2427</sup>再者,还有一些在平阳做官而占籍者。平阳路诸色人匠达鲁花赤苏公式,云中人,早年侍奉元太祖,元初,“游官徙居是邦”,遂定居于此。<sup>[25]尧都区卷43—44</sup>达鲁花赤是元朝在地方各级政府及非蒙古军队中均设的一种官职,由蒙古人和个别回回、畏兀儿等色目人担任,他们可以携家眷赴任,到任后选择任官地为定居地。是时,民族间的通婚已相当普遍。金泰和六年(1206年)十一月乙酉日,章宗下诏“屯田军户与所居居民为婚姻者,听。”<sup>[26]278</sup>有金一代多采取“听与契丹、汉人昏因以相固结”的做法。平阳杂剧家石君宝所作的《诸宫调风月紫云亭》中,讲述了汉人韩楚兰和女真完颜灵春相爱结合的故事。蒙古统治者亦如此。河津史千与完颜氏、呼延氏结亲,生子用礼和至德,分别任河津诸军奥鲁和监河津课。<sup>[22]史千墓碑6</sup>泽州长官郑鼎子制宜,“贤俊明敏,早有时誉,李罗丞相,爱其才,擢为子婿。”<sup>[27]1055</sup>除了统治阶层内部的通婚之外,民间通婚也很普遍。池内功提出蒙古人下层“与汉人通婚的频率和程度及与汉人社会的密切关系要胜过蒙古上层”<sup>[28]54</sup>,原因是蒙古军队长期屯驻一地,

与当地汉人接触和交往增多,双方为了互相利用对方的政治和经济优势,故通婚较多。不同民族间的杂居与通婚加速了民族融合的进程。

### 三、叠加:民族融合与文化再造

移民是文化的载体,金元时期,女真、蒙古等族的文化内容,如音乐、舞蹈、语言、“辫发椎髻、深檐胡帽”的穿衣打扮、婚丧礼俗的社会风尚传入平阳,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形成新质文化。葛兆光曾提到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汉族传统文化变化很大,他说“以时髦的‘现代性’一词来说,我总觉得,中国城市商业、娱乐与市民生活方式,即现代性发展最快的,可能恰恰是在两个所谓异族统治的时代,即元与清两个王朝。”<sup>[21]16</sup>确实如此。平阳戏曲中就包含许多民族元素,如戏曲曲调广泛融合了女真、蒙古等民族的音乐和歌唱,形成了与“纤徐绵邈、流丽婉转”风格迥异的“北鄙杀伐之音”的武夫马上之歌。又如,戏曲唱词中多夹杂俚质的方言或俗语,像大大咧咧为女真语“喇忽”,意为不整洁的“邋遢”等,原本都是女真语。<sup>[29]63</sup>再有,戏曲作品中的思想内容也受到了当时草原民族开放思想的影响。如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本身是当时通俗文学繁荣发达的最好证明。游牧部族的女性比较自由,这种非汉族的传统民俗自然要随着统治秩序的确立而对整个社会产生影响,使得男女关系要比汉族政权下的社会开放得多。这种社会氛围,为董解元以崔莺莺和张生相偕出走最终获得美满团圆,来代替元稹的悲剧性结局这一做法赋予了合理性。可以说,在蒙元统治下,儒学文化松动,市民的娱乐方式多样化,城市发展较快,再加上少数民族对戏曲喜好的需求以及积极参与戏曲创作与戏台修建,使戏曲更贴近民众生活,进而流行起来。

当然,戏曲的兴盛,与金元时期政策尤其是科举制度有关。金代注重科举,从而培养了一大批士人。元人王恽指出,“金源氏崛起海东,当天会间,方域甫定,即设科取士,急于得贤”,“故文风振而人才辈出,治具张而纪纲不紊,有国虽百余年,典章文物,至比隆与唐、宋之盛。”<sup>[30]浑源刘氏世德碑503</sup>明昌初,平阳为词赋、经义进士等的府试考点之一<sup>[26]1146</sup>,成为士子的积聚之地。大安初,平阳府试,举子万人,“揭榜之时,三元皆出河东”,状元王纲,即是平阳人。<sup>[31]平阳贡院鹤77</sup>然而,元代科举不振,因为元人认为词赋乃摘章绘句之学,“浮华过实,故所不取。”<sup>[21]2018</sup>这对于金代培养出的广大儒生而言,其学“固不能为学术上之事,而高文典册,又非其所素

习也”，于是，部分人进入到“游民”“市民”“清客”“浪子”行列。可就是他们促成了戏曲的创作、演出与欣赏的兴趣，这样，“有一二天才出于其间，充其才力，而元剧之作，遂为千古独绝之文字”。<sup>[6]77</sup>文人的参与，提升了戏曲的品质，毕竟“任何一种文学样式，想要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学标志，没有文人的参与是不可能的”。而“文人的参与创作，意味着一种深邃的文学意识和高度的文化修养对文学样式的渗透和文学品格的提升”<sup>[32]141</sup>。可以说，元杂剧能够兴盛，是与文人的参与创作密不可分的，诚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金元时期，实行宽松的宗教政策并形成了统一的管理制度。<sup>[20]272—273</sup>在平阳大地，《赵城藏》的刊刻，显示出平阳佛教鼎盛局面的到来。与之同时，道教盛行，平阳的道教有全真教、大道教、正一道教，其中全真教势力最大。<sup>[33]150—214</sup>平阳府南有尧庙，有元一代，尧庙以及供奉的帝尧由道家主持祭祀，尧还被封为紫微天官大帝，作为道教神祇被民众祭祀。由于统治阶级的提倡和推崇，佛道人士成为基层社会中有影响力的群体，在诸如水利、庙宇、桥梁等公共工程的修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洪洞县城北五里庄西南有惠远桥，为南北通衢，但每当夏秋之时，水患频仍，“不得渡”。元大德二年（1298年）僧录文妙太师广公亲率其徒募建，桥成，“自是居民无岁役之劳，行者忘滞留之叹。”<sup>[34]惠远桥记308</sup>大德七年平阳大地震，洪洞广胜寺明应王殿遭破坏。此后数年，该寺屡有重盖修缮，多为僧众主持。<sup>[25]洪洞县卷上73</sup>尧庙因“岁年深远，室宇蔽陋”，渐就倾圮。至元五年（1268年），有全真道师靖应真人姜善信“以道众行化河东，更择爽垲，重建庙貌”<sup>[25]尧都区卷50</sup>。佛、道势力渗透平阳地方事务，其信仰也随之深入民间普通民众之中，因而在俗文化如戏曲、雕版印刷中大量反映着宗教内容，如平阳杂剧的诸多作品《鲁大夫秋胡戏妻》《李亚仙花酒曲江池》《晋文公火烧介子推》《迷青琐倩女离魂》《梅香骗翰林风月》等渗透着轮回、因果报应等佛教观念。而《包待制智勘灰阑记》《地藏王证东窗事犯》等则直接借助历史故事阐发佛理。<sup>[35]8</sup>另外，以通俗语言宣讲佛经的方式——俗讲以及由此产生的底本变文对平阳地区说唱艺术的产生以及戏曲发展都有一定的影响。如鼓子词、唱赚、转踏、大曲、诸宫调等说唱歌舞的形式，都明显遗留着俗讲曲本的结构痕迹。<sup>[36]129—130</sup>这一传统影响至今，2006年，李文在夏县瑶峰镇庙前村见到了说唱变文的演出，且不仅这一地，稷山、河津都有类似的演出。<sup>[37]37</sup>由上，可以想见平阳地区文化的繁盛与

佛、道教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

#### 四、结语

历史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重建的。保罗·康纳顿曾说“我们对现在的体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有关过去的知识。我们在一个与过去的事情和事件有因果联系的脉络中体验现在的世界。”<sup>[38]导论2</sup>也就是说，历史是一个时代在另一个时代里发现的值得注意的那些东西的记录。平阳文化的发展作为过去的历史，自明清以来不断被学者记忆和重构着。当然，这种备受关注是因其丰富的历史遗存为前提的。从空间概念来看，平阳特殊的山水环境造成其本身地理形势的封闭性，但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这区域的稳定。入元后，平阳又成为“腹里”之地，因与统治中心的关系尤为密切，服务于市民的俗文化因而勃兴。从时间概念来看，金元时期是民族的大融合时期，平阳作为民族交融之地由来已久，尤其到了金元两朝，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因军事屯田、作战镇守、诸王分封、任官调职等各种原因徙至平阳，与当地汉族杂居和通婚，他们的音乐、舞蹈、语言、穿衣打扮、婚丧礼俗等影响汉族文化。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富的平阳文化，因外来移民的冲击而发生着新的变化，日渐丰富而驳杂。

#### 参考文献：

- [1] (美) 杜赞奇. 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M]. 王宪明, 等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
- [2] 葛兆光. 叠加与凝固——重思中国文化史的重心与主轴[J]. 文史哲, 2014 (2).
- [3] 乔新华. 为什么是洪洞: 大槐树下的文化传统与地方认同[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0.
- [4] 周征松. 平阳的神尧祭坛[A]. 家族史研究及其他[C].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9.
- [5] 谭其骧. 山西在国史上的地位[J]. 晋阳学刊, 1981, (2).
- [6] 王国维. 宋元戏曲史[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 [7] 黄永年. 古籍版本学[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
- [8] 车文明等. 平阳宋金元戏曲文物研究[M]. 延吉: 延边大学出版社, 2005.
- [9] (清) 叶德辉. 书林清话[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 [10] 北京图书馆编. 中国版刻图录[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0.
- [11] 李晋林. 金元时期平水刻版印刷考述(上)[J]. 文献季刊, 2001 (2).
- [12] 戚福康. 中国古代书坊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2007.
- [13] 李致忠. 中国出版通史[M].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08.
- [14] (宋) 乐史. 太平寰宇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 [15] (南朝宋) 范晔. 后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 [16] (唐) 房玄龄. 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17] (宋) 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 [18] 安介生. 山西移民史[M]. 太原: 三晋出版社 2013.
- [19] 陈寅恪. 陈寅恪先生全集[M]. 台北: 里仁书局, 1979.
- [20] (元) 宇文懋昭. 大金国志[M]. 济南: 齐鲁书社, 1998.
- [21] (明) 宋濂等. 元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 [22] (清) 胡聘之. 山右石刻丛编[M].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8.
- [23] (清) 吴廷燮. 金方镇年表[M]. 辽沈书社, 1985.
- [24] (元) 郝经. 陵川集[M].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2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 [25] 王天然等主编. 三晋石刻大全[M]. 太原: 三晋出版社 2011.
- [26] (元) 脱脱等. 金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27] (明) 李侃、胡谧. 山西通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8.
- [28] (日) 池内功. 元代的蒙汉通婚及其背景[J]. 郑信哲译. 民族译丛, 1992 (3).
- [29] 刘纬毅. 三晋文化的特质[J].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8 (1).
- [30] 李修生主编. 全元文[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8.
- [31] (金) 元好问. 续夷坚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 [32] 葛兆光. 唐诗过后是宋词[J]. 读书杂志, 1994 (12).
- [33] 林宏跃. 临汾宗教[M].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6.
- [34] (清) 张金吾. 金文最[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 [35] 张瑜. 元代平阳杂剧中的佛教观念研究[D]. 太原: 山西大学 2011.
- [36] 廖奔、刘彦君. 中国戏曲发展史[M].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0.
- [37] 李文. 金代河东南路戏剧研究[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4.
- [38] (法) 保罗·康纳顿. 社会如何记忆[M]. 纳日碧力戈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 Bifurcated History: The Emigrant's Factor about the Superposition Culture of Pingyang in the Jin-Yuan Dynasty

LIU Li , LIU Jia

( *Modern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Linfen , Shanxi 041004 , China* )

**Abstract:** The Pingyang special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formed its relatively closed geographical space and maintained the limited stability , leading to the emigrant's shelter in the turbulent ages. In the peaceful period , it became the large emigration of populations , which helped to spread the culture of Pingyang. Closing and stability made the region keep a great deal of cultural objects and historic relics , becoming the importance basement to construct the Jin-Yuan dynasty culture of Pingyang in the period of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Certainly ,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e was not only solidification , but also superposition. In history , the region of Southern Shanxi was the big stage of integ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between different ethnicities. The emigrants from outside were transformed by Chinese culture , but they also influenced the local lifestyle with their unique tribal customs. Particularly during the Jin-Yuan Dynasty , the differences in culture and governance principle brought by Nvzhen and Mongolian Ethnic Groups be came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abundant and mixed Pingyang.

**Key words:** Jin-Yuan Dynasty; the culture of Pingyang; emmigration